

东周时期岭南地区青铜礼器的价值和意义*

◆ [美]洛撒·沃恩·福克哈森 著
◆ 奚国胜 译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彭劲松 校 (江西省文化厅外事处)

入门初探

上世纪后半叶,中国的许多考古发现,使我们对早期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路.我们逐渐认清了新石器时代后,在中国先民文化发展史及与之共存的各代王朝的兴亡史中,许多具有区域性特色的文化面貌。中国历史文化光辉灿烂至今,其激流勇进决不因发生于公元前 221 年的政治统一而告终,而且总是以起源于很早的各地区、各民族血缘的互为融合、吸收同化巨浪的澎湃之势向前推进。

在中国早期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岭南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从字面上说,岭南,即山脉的南部。其地理位置处在长江流域的南面,是珠江和西江的分水岭。其山势雄伟磅礴,为古代的一座天然屏障。北方先民把这一地区称为“南越”,南北联系并不密切。的确,商周时期南越不是什么亲密邻邦,它们之间还隔有长江流域的一些诸侯国,史籍上对其鲜为记载。东周时期(公元前 770-221 年),长江流域地区的政治文化与北方逐渐同化,但对极为偏南的岭南地区却影响甚微。

我们知道,岭南地区的人文概貌在种族语言上与北方明显不同。在北方的早期记载中,把岭南人和长江南部非属周朝的人群统称为“百越”,这是对当时交流较疏远、政治较分散人群的一个冠称。他们没有国家形式和自己的城市,人们只是在推崇首领的组织下,形成了人类学家所称为的部落氏族。在这些南部地区,教科书上经常述及到那些人野蛮、未经开化的习性,例如:头发剪得很短,有纹身的习惯。他们衣着简陋,常以比较粗糙的植物根茎纤维作为衣

服,并以江江湖旁的桩屋为居住地。然而,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接受“百越人都一样”的传统概念。即便今日,岭南地区的人种仍然非常复杂。中国这部分地区长期以来居住着不同种族和语言的人们。如果我们离开考古学角度就很难说清楚这些事情。考古发现已经表明:尽管种族不同,许多文化面貌特征和社会活动遗迹仍然广泛地分布在中国南部大部分地区。

关于中国南部地区民族学人种学的研究在最近的学术论文中都有详尽的讨论。我们注意到,发掘出来的实物已告诉了我们这些地区的青铜时代晚期是如何划入当时扩大了“中国势力范围”并且它们的社会文化结构如何受到与其相连的北方地区的影响。这里,我们按照文化面貌和地理位置划出四个主要地区:1.北方中国的王室中心地区;2.具有地方文化色彩的长江流域地区;3.岭南地区;4.东南亚地区。对文化类型风格演绎的研究和用梳理时代进程排序的方法便能对它们进行一些历史的追溯和综合的研讨。而考古学上的科学记载,便是对这些地区在思想意识、治理形式、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生产、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等各方面的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最好解释。细心研究、认真探讨是我们领略岭南地区文化面貌的基本原则。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渗透、互为融合的过程,而正是这种过程孕育产生了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

研究现状

岭南地区的青铜时代起始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铸有各种合金比例不同的青铜器物,出土物并不

*译自《东亚考古》2001 年 VOL.3

表一 在广西和广东发现的青铜时代晚期礼器和钟鼎

地 址	出自	年 代	索 引
广西恭城秧家	墓	公元前六世纪中期	Kaogu 1973.1:30- 34.41 GuangXi Zizhiqu Bowuguan et al 1978.nos, 40- 45
广西横县南乡		公元前六世纪	Kaogu 1984.9.803- 804
广西柳江木罗村		同上	Wenwu1990.1:92
广东溆罗大沥散屋村		同上	Kaogu yu wenwu 1987.6:15- 16,24;Guangdong Sheng Bowuguan et al 1990.nos 51- 57
广东增城汤村			Wenwu1992.12:72
广东 M1 庆远马头岗	墓	公元前六世纪晚期	Kaogu 1963.2:57- 67Guangdong sheng Bowuguan et al.1984:225- 229
广东 M2 庆远马头岗	墓	同上	Kaogu 1964.3:138- 142
广东罗定背夫山	墓	公元前五世纪早期	Kaogu 1986.3:210- 220.GuangDong Sheng Bowuguan et al 1990.no.59- 67
广东 M1 罗定南门垌	墓	公元前五世纪中期	Kaogu1983.1.43- 48.29 GuangDong sheng Bowuguan et al 1984:278- 279
广东四会鸟蛋山	墓	同上	Kaogu 1975.2:102- 108
广东和平龙子山	墓	公元前五世纪	Yang shiting1998:122- Table2
广东怀集摘马山	墓	同上	Yang Shiting1998:122 Table
广东肇庆松山	墓	公元前四世纪中晚期	Wenwu 1974.11:69- 79 Guangdong Sheng Bowuguan et al 1984:264- 275
广东兴宁鬼树窝	墓	公元前四世纪	Guangdong Sheng Bowuguan et al 1990.nos 72- 77
广西 M1 宾阳韦坡村	墓	同上	Kaogu 1983.2:146- 148
广西 M2 宾阳韦坡村	墓	同上	Kaogu1983.2:146- 148
广东广宁龙嘴岗	公墓	公元前四世纪晚期	Kaogu 1998.7:621- 635
广西梧州唐源	墓	公元前 4/3 世纪晚期	Guangxi zhuangzu zizhiqu Bowuhgual,et al 1978.no 50
广东广宁铜鼓岗	公墓	公元前 4/3 世纪	Kaoguxue jikan I (1981):111- 119;Guangdong sheng Bowuguan et al 1984:no. 87
广东四会高地园	墓	公元前三世纪早期	Kaogu 1985.4.360- 364.384
广东封开猛虎头山	墓	公元前三世纪	Kaoguxue jikan 6 (1989):69
广东封开斑石	墓	公元前三世纪	guangdong Sheng Bowuguan et al 1990.no.58
广西平乐银山岭	公墓	同上	Kaogu Xuebao 1978.2:211- 258;Gx ZZQBWG et al 1978.nos 51- 69
广东德庆落雁山	公墓	同上	Wenlou 1973.9:18- 22
广东揭阳面头岭	公墓	同上	Kaogu 1992.3:220- 276,203
广东乐昌对面山	公墓	公元三至二世纪	Kaogu 2000.6:517- 541

十分丰富。同时发现了一些在公元前 500 年期间从北方传入的器物,如容器和甬钟。但是,在岭南地区被认为是最早的本地精品,其年代也不会早于公元前第六世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以广州为中心,在广西的东部和广东的西部之间约 350 公里的周围地区曾挖过 12 座大型墓葬,出土有大批文物,包含了岭南各地本土制造的青铜器物,从考古角度上阐明了岭南青铜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状况。(见表一)

近来,多数学者都沿袭传统史编所持观点,即岭南很早以前曾为越王朝的一部分。在摆脱了越的统治之后,于公元前四世纪末为楚国所占领。公元前 219 年划入大秦统一的版图。弗朗希施·奥拉德极力推崇的因文化的相互渗透而促使民族融合的人类学理论模式在楚文化与越部落氏族间融合的渗透过程中,又一次得到了印证。越国,是不属于周朝的南方国家,它以浙江北部为核心,日益向周朝的诸侯

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至于后来向北发展,波及到长江下游的某些地区。据考古证实:青铜时代,南方广大地区,包括越国、岭南在兵器的种类、器件的形状和纹饰图案等方面都具有相似的文化面貌。

东周时期的南方楚国,其主要文化特征,至少在贵族治阶层中实行的礼仪礼节与北面邻邦几乎一样。公元前七世纪末,楚国从至今还存有争议的原楚地向外扩张,征服占领了现今的湖北中西部和河南的西南部。最近的考古发现基本证实了研究先秦历史学的专家们的观点:“春秋时期,楚地的范围还未及湖南。”公元前六世纪中期,楚国的疆土限于长江南部,洞庭湖周围地区,战国时期,楚国沿着湘江向南扩张,直达长沙和常德。公元前四世纪和三世纪的一些墓葬已证实了此种情况。楚国势力的这些地区,于公元前 278 年被秦国所征服。

楚国的扩张,使其文化逐渐地与湘江流域土族

域
外
视
野

先民相互渗透,与人们所知的扬越部落氏族也循序渐进地融为一体。根据当地青铜器物的特点,可使人们追溯寻及公元前1500年左右青铜发展分支的源头。然而,流行于战国时期的湖南地区青铜器物极具当地特征,却不见楚风之韵,与楚墓出土的器物时代相当。这就足可抨击反驳那种不加区别地把江南地区不是周朝的群体部落统称为“越”或“百越”的论调。许多考古发现提示我们:在湖南、江西以及长江下游地区有着独特的青铜文化发展阶段。这些地方成为向岭南地区输入青铜器的传送渠道,渐渐形成了区域特色文化风貌。依次留下了文化发展的运行轨迹。

整个东周时期,楚国与岭南地区的直接联系几乎很少。当地居民处于非常原始的文化发展阶段。表一列举了青铜时代晚期统治者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这些早期的青铜器可能是征服军作为日用器带入该地区。当我们研究这些制作粗糙,但具有中国北部东周青铜器结构形态时,我们看到了先秦时代的作风。虽然在这里没有连续的墓葬器供讨论,但是它们在先秦年代的地位确实无可非议。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器物在风格上清晰地显示了当地文化特色。在公元前500年期间,这些青铜器和铸造技术输入于岭南地区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公元前六世纪以后,增加了其数量并出现了等级较高的墓葬。它可能涉及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可以推测,沿着这条线索,楚国的经济兴盛期,促进了与更远南方进行贸易的要求,导致了新的或强化的贸易网络。这也可能使楚国扩疆到湖南,并驱使那个区域的原部分土著人进入更远的南方地区。

然而,这些历史细节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思考题:对于岭南青铜时代晚期墓葬内极具价值的器物,我们如何揭示北方输入物在文化风格上对其产生的影响?它们又怎样与北方输入物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风貌?现在展示在人们眼前的精美别致的器物,在当时又如何显现拥有者的社会地位?限于篇幅,难以对附文所列器物进行详尽全面的研讨。这里,我将把重点放在岭南墓葬出土的两种典型的器物群上。它们的时代分别为公元前六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一是恭城秧家的青铜器,二是肇庆松山的青铜器。最后将着重引证这一地区的两座颇具价值的汉墓,进一步阐述秦朝统一后的历史演变。

出土于恭城秧家的青铜器(实例一)

1971年广西恭城秧家有幸获得了一批有价值的青铜器。因抵达较晚,未能获得全部葬品,墓葬形

制也面目全非,所剩器物的风格品质也不尽相同。它们被分为三个组,这些器物门类比较清晰明了,多数为岭南本地所造,时间可达几个世纪。

1.“船形斧”中国称之为钺。据说这种钺是中国东南地区土著青铜文化中犹如图腾模样的标志。疑惑的是在土著越语中为何冠以这样的名称,连当地人也难圆其说。斧形器的使用,遍及江南大部分地区。其简单明了的几何图形装饰与年代相同、周朝北方的器物不大一样。发现于肇庆本地铸造的一些器物也以同样的装饰为特征,它们包括各种类型的工具和以公牛为装饰图案的器物配件。

2.容器 有一种被称为“越式鼎”的器物似乎是当地生产的。扁平底,有三条向外弯曲的细长足,器侧附有平展的手柄,广泛流行于公元前八世纪至二世纪的中国南部与东南部地区。在考古论述中,对各式三足器的分类标记并无严格的要求。与北方青铜铸造工艺一样,这些三足器的铸造,使用的是条块范模拼制技术,器表留有明显的浇铸接缝。物件表面一般无装饰,且器壁较薄,有的配置器盖,并装有可活动的拱形手。这四件出土于秧家的“越式鼎”是至今为止所报道的岭南地区此种类型的最早实例。根据器物的简易造型和实用性能,应为当地所造。

3.乐器 秧家发现的两件甬钟其形制风貌的演进较为复杂。公元前1000年左右,甬钟在长江中游地区十分流行,后被传入在陕西的西周王朝中心区域,长江流域的古代青铜文化对中国北方宫廷御用的典雅高贵的礼乐器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器物装饰与周朝其它铜器较为相似,很快地在贵族阶层中传播流行。江南工匠在倾心铸造钟器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方风格,同时也因受到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以至于时代较晚的南方甬钟有许多方面予以了改进。比如从春秋早期后,甬钟常常成套成系列地生产,这种变化在周室王宫的中心地域十分明显。

岭南贵族墓葬都有这样的系列套钟。秧家的两座墓葬出土了七件为一套的甬钟(见表二)。它们抽象而又简单的纹饰与东周北方常以龙的衍生物为主要装饰纹样的格调不一样。另一种称为“钲”的南方实物样本,其正面无纹饰,而北方样本的正面却被铭文所覆盖。相比之下,岭南当地格调的甬钟,其装饰极为单调。这种情形似乎告诉人们:与北方甬钟不同,岭南铸造的甬钟以夸耀身份为主,音乐演奏次之。

4.酒器 一种更值得注意的,体现了长江流域

地区主要风格和艺术风貌的器物代表是秧家的两件铜尊。它们器形相似,但装饰格局不同。与同期的地方器物无任何联系。1号铜尊以两条蛇形、蛙和蝶螭形图案装饰为特点,在器表上以绳带状展开。2号铜尊与1号铜尊不同,它以一条菱形图案作为主要装饰带。在宽带里布满了圆圈小点,带中还有十字形组合的怪异图形。在器物下部还有斜“S”形的漩涡纹饰。这两件铜尊分别代表了岭南当地风格的两个典范。一个突显艺术品味,另一个颇具抽象概念。较晚的铸件铭文装饰行的是阴文(器表字迹下凹),而这两件铜尊铭文所行的是阳文(器表字迹上凸)。一般来说,东周的青铜礼器多为阴文,阳文少见,此可显示拥有者社会地位的等级之差。

很少器物有像湖南湘江流域发现的这两个铜尊上的纹饰,这可能是这种纹饰的发源地。而另一铜尊,在其张开的嘴内有蛇头充塞其中。这里还展示了三个卣。光从孤立的风格来看,是很难确定它们的年代。但是,在秧家出土的器物,通过与北方流入的、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后制造的青铜器作一比较,就可以推测这两件铜尊和卣是那个时代稍前一点时间制造出来的。

公元前六世纪,对尊与卣的使用已进入较晚的时期。黄河流域曾把它们作为贮酒器使用。像许多贮酒容器一样,在北方,它们于公元前850年左右,经西周晚期礼仪制度改革后就不再作贮酒之用了,但是,这些被遗弃之物在中国南部地区却继续铸造,使商周时期这些器物的原先器形得以流传下来。皖南屯溪古墓出土的器物证实了这一历史现象,并显现出了与当地风格融合后的最早格调。例如,屯溪3号墓中,西周期制作的卣,以凤凰为装饰图案,具有明显的北方风味。紧挨此卣还置放了几件当地制造的卣,用几何图形装饰,表现了类似于几何图形印纹硬陶装饰的南方风格。墓中还有类似于这种风格的铜尊。青铜器上几何图形纹饰的风格,在长江下游和浙北地区至少要延续到公元前五世纪。

以上述及的秧家器物和部分南方器物都是铸造于东周时期,与周文化较疏远的江南地区,但与商周传统礼器又有不可分割的某种联系。这些被人称为“中介类型”的青铜器物群揭示了青铜文化演进盘根错节的发展过程:一个地方的原始文化在被它种文化渗透融合后,会转化成一种或几种新的文化体系,并在浸润之地有序地演化下去,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景观。这些饱经风霜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物向人们展示了中国青铜文化那种千丝万缕的发展演进关

系。这可谓是一部无价的“金书”,而岭南的青铜文化当为此书中的闪光一页。

发现于肇庆松山的青铜器(实例二)

这是位于广州郊外肇庆松山的一座古墓。墓室长7米,宽4.5米,为独立的砖石大墓,墓室内置满了各类葬品。器物组合反映了时间推进后发生的变化,但与秧家之墓还有许多共同之处。

墓中除21件兵器、40件工具24件其它青铜器物外(大部分为本地铸造),还有四件重要的青铜礼器。其中一件是银白漆嵌饰的容器壘十分引人注目,是已知同类器物中唯一独特的一件。其繁茂华丽的装饰和尖端高超的工艺令世人赞叹不已。此器很可能是公元前四世纪末楚国所制。

另外,墓中还出有一把提梁壶,整体为方格纹带状饰。与此十分相似的壶,在湖北靠近楚都的江陵马山1号墓地有发现。松山还有一件非同一般的三足盘,平底、直壁,在稍有凹陷的器表上饰以杂乱无章、毫无规则的动物群体图案。它是北方进入松山的最后一批输入物,被当作炉盘使用。上述两件器物,壶和盘,是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与楚国青铜器风格最接近的器物。楚国的艺匠们在打造瑰丽多彩的楚风艺术的同时也吸取了周朝时期其它地域所具有的艺术精华。在松山的北方传人物中,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能与中国任何地方发现的东周时期高水准的青铜器物相媲美。

松山墓葬还出有六件成组的一套甬钟。与秧家的相比较,其装饰十分简单,为岭南本地所造。这种具有地方格调,曾广泛流传于长江流域地区的甬钟,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逐渐消失,往后仅见于岭南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北方风格的楚制之器。

地方风格的甬钟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成为与上述提及的秧家“越式鼎”相类似器物。“越式鼎”原产于长江中下游的青铜时代,后引入岭南地区,在北方消失之后,后者继续制作。顺便提起,在松山发现了六件这样的“越式鼎”。

秧家所缺的一种代表性器物是本地区铸造青铜壘,其发现于松山。虽然在器形上与北方同类器有些不同,但在那一时期,东南地区却用青铜浇铸了这种形状的容器,并逐步使其改进成了礼器。这已被出土于浙江中部的绍兴306号墓的器物样本所证实。松山青铜壘的装饰工艺与用作乐器的铜鼓十分相近。铜鼓原创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现今的云南地区,并以很快的速度在中国南部边缘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流传开来。铜器上的几何图纹装饰与高温硬陶

表二 灿若群星的广西和广东青铜时代晚期礼器和钟

地址	“越式鼎”	钟	已发现的其它青铜器
广西恭城秧家	5	1甬钟	1鼎, 2尊, 1浴缸
广西横县南乡		1甬钟	
广西柳江木罗村		1甬钟	
广东博罗大沥散屋村		7甬钟	
广东增城汤村		1甬钟	
广东 M1 庆远马头岗	2	5甬钟	1盆, 1壘, 1缸
广东 M2 庆远马头岗		7甬钟, 1缸	1浴缸
广东罗定背夫山	2	1埭	2浴盆
广东 M1 罗定南门垌	2	5甬钟, 1钲	2浴盆, 1缸, 1盖, 鼎, 1青斗
广东四会鸟蛋山	3	1埭	1青斗
广东 M1 和平龙子山	1(?)		
广东怀集獬马山	1+(?)		
广东肇庆松山 1 水桶	5	6甬钟	2壘, 1 梁壶, 1 盆
广东兴宁鬼树高		6甬钟	
广西 M1 宾阳韦陵村	1	1甬钟	
广西 M2 宾阳韦陵村		2甬钟	
广东 M4 广宁龙嘴岗	1	1埭	
广东 M5 广宁龙嘴岗	1		
广东 M13 广宁龙嘴岗		1盆	
广西梧州唐源			1鼎
广东广宁铜鼓岗	4		2盆, 提秤型青铜器
广东四会高地园	1		提秤形青铜器
广东封开猛虎头山	1		
广东封开斑石	1		
广西平乐银山岭	8		2铁脚鼎, 7 盆
广东德庆鹤雁山	1		盆
广东揭阳 M1 面头岭	2		
广东揭阳 M2 面头岭			1壘(?)
广东揭阳 M3 面头岭	1		
广东揭阳 M7 面头岭	1		
广东揭阳 M11 面头岭			1壘(?), 2 盆
广东揭阳 M14 面头岭			1壘(?), 1 盆
广东乐昌对面山	7(?)		

的纹饰十分相像。岭南地区的文化轨迹有力地表明，它与中国西部如广西、云南和越南北方的历史文化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影响波及于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这种文化景观在松山出土的青铜器物中可窥一斑。

论点阐述

从出土于两处墓葬的青铜器物群中，我们能窥视出墓主所代表的贵族阶层的一些什么社会迹象呢？尤其是输入青铜器有些什么作用和意义呢？

首先，岭南墓葬的青铜器与周代王室区域的器物极不相同。与周朝各盟国贵族墓中的礼器相比，其种类和数量显得较少。周朝贵族大墓有一个显著特征即随葬的列鼎甬钟礼器按墓主的身份都有一套严格的等级规定，而岭南墓葬却相形见绌并非如此。

在中国北方，青铜礼器是用以祭祀祖先、维持社会族群关系而举行的庆典礼仪、宴请聚会等各种活

动的。墓中祭坛式的器物置放折射了这种礼仪。另一方面，岭南大墓的青铜礼器也反映了南方人在信奉礼仪方面存有的差异，不仅种类款式极为有限，而且器物配备也不尽相同，盛肉盛食的鼎，在北方的中心区域是系列器物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岭南却并非看重。当地人十分钟爱水盆之类器物。它们的器形和功用与本地烧造的陶器十分相似。在北方，类型各异的青铜器物（如鼎、簋、敦、豆等）在使用行礼时都具有各自特定的礼仪。然而对岭南人来说，却显得不怎么“照章办事”。表现在这些器物输入岭南后，当地人就用长期使用陶器的方法来使用它们。比如松山的壘与壶，一直被视为心中所推崇的某一陶器相似之物。同样，秧家发现的唯一北方格调的铜鼎极有可能单从实用功能角度考虑，被三足器“越式鼎”所吸收、替代，并在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人们所使用。

如此相异的器物能长期共存于一个以当地文化为背景的同一环境中，这种状况与当今第三世界在

引进国外先进“装备”时,通常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所筛选地择其所需来填补自己的空缺,进而使其融合在适合本地特点要求的文化氛围中的情形十分雷同。这种历史现象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长期交往的进程中。这种交往受制于本土文化所具有的极强的生命力,防止避免了当地文化的全部异化。

对于青铜时代晚期输入岭南的青铜礼器这一文化状况的讨论显得尤为重要。从当地贵族拥有的礼器来看,器物的档次还是比较高的。他们把自己拥有的贵重礼器视为富有的夸耀,更是社会地位高显的象征。人们不禁自然联想到史前晚期的欧洲中心地区当时的情况很象岭南,它处于周围地域经长期开发经济高度发展、文明程度先进的热土边缘之中。彼得·威尔在一篇研究与地中海地区有关的考古学术论文中指出:一部分贵族操纵掌握贵重物品的输入途径并对其实行占有垄断,以促成优势于某些权力竞争者的局面的形成,经过一定酝酿过程,会导致意义非凡的政治权利的升级与集中。建秦之前岭南地区的情况是如此相象。

从现有可信的资料来看,很难探明秦统一之前,有关岭南地区是如何操控礼器输入的具体细节。然而人们可以开阔思路作一些推测:岭南贵族们对北方强有力权势的垂涎、兴趣、欲望,而一般平民百姓对周朝“国事”却是无心理会,对其阴险恶欲更何谈提防。北方文化毫无限制地在南方拓展延伸。可想而知,秦之所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全国与当时北方文化对南方地区产生的影响效用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不能排除以下的一个观点:北方向岭南输入礼器的贸易交往与其说是一种具有商贸赢利的行为,还不如说是对岭南贵族阶层的诱惑、感化,以达到颠覆、并吞之目的。显然,在这样的交易中,国家及其代理人,至少对“北方一边”来说,扮演了重要角色。

就此而论,我们推崇这样的观点:古代有些贸易往来往往具有政治色彩的特征。这种观点尤为适用于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状况。中国历代所进行的一些豪华用品的交易,实质隐含的是定期的接纳贡品和交际礼品。至于岭南对北方邻国输入的华贵物品要回贡多少,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奥拉德根据众多的资料列出了各种各样足使楚国垂涎三尺的回贡品。如象牙、肉桂、珍珠、犀牛角和孔雀羽毛饰品等。有的学者持这样的观点:秦统一前,岭南经济水平之低,政治发展之慢,无法生产出维持常态商贸所需的物品。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流行于中国

青铜时代大多数时段的商贸模式,即便到了后期,商品交易并不要求双方对等均衡,而是另有苛刻之意,“礼品”、“贡品”实质上就是王室领地之外的豪门贵族通过朝贡来获取权力中心赐予贵重礼器的媒介物。

我们要搞清楚岭南地区的酋长首领们在交易体系中是如何获得青铜礼器的。可以说,交易体系网络是错综复杂的,独家操控和处于岭南与北方之间的群体媒介担当了重要角色。纷繁绚丽的青铜文化交流使我们萌生了这样一个思路:即有一个外来青铜器直入岭南的专门通道。从占有者所拥有的各式各样的器物器形来看,物源供应决不是单一的。在很多方面还反映了岭南搬照周礼的程度不是很深的社会迹象,暗示了与周文化还存有不小的间隔。因而岭南的酋长豪门在北方贸易伙伴的眼目中,还没把他们置于周代盟国统治者和显赫贵族等的位置上。

岭南墓葬中发现的套钟也许能够解释这一现象。把它们与东周晚期长江下游发现的套钟相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已例举了出土于别处的楚制甬钟。那些具有周代式样,而又显现楚式风貌装饰特点的套钟成为公元前六世纪中叶长江流域地区的参考标准。周文化时代的套钟组合制度,限制了他们高级贵族成员的排行。那一时期南方政体的统治者如越国,吴国都逐步向周代模式贵族国家方向发展。他们以接受外交礼物、礼品的形式收纳楚国风格的套钟,以此象征他们与楚国的政治联盟。相比之下,岭南却长期缺乏具有楚风的甬钟。这意味着当地首领不具政治礼仪上的高贵名望以至于他们没有资格接纳这些高贵的礼器。不管当地酋长首领们给予北方政治伙伴什么贡品,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些杂物,而不是象甬钟那样高级别的礼器。出于拥有这些礼器的热望,而又无能力铸造这种同等质量水准的甬钟,岭南酋长们竭尽全力支撑当地类型甬钟的铸造。成品质陋艺拙,表面上看去有点像楚钟,但其工艺极不到位,以至于不能成为正规的乐器、礼器。即便这样,拥有这些甬钟,以此来炫耀浮夸自己,对酋长们来说,却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尽管在演奏当地音乐时,它们只能充当伴奏用的打击乐器而已。似乎在岭南地区未必有周朝的礼乐和复杂的乐理知识,只是有一些相类似的,在细节上作了修改的东西。

楚制的输入器物在秧家、松山都有发现。从考古角度上揭示了岭南与楚国的交往和联系。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输入器物一进入岭南,就牢牢地扎根于当地文化发展的进程中。这种粘附于当地传统风

俗中的文化渗透,持续于楚国统治的兴盛时期,或者更长的时间中。楚制豪华贵重器物的流传与拓展,在战国时期的中国南方广大地区都可觅及其留下的不凡足迹。在松山眼花缭乱的楚国输入物中,使人联想到这样一个总的趋势:我们应该多做商贸交流网的扩大工作,而不是停止在领地争议上。

后记:早期汉墓中的当地留存物

秦对岭南的征服引发了首次来自北方的移民潮,随即开始了持久的文化交往。考古发现揭示,公元前219年之后岭南地区的文化演进不是一个突发的标记,而是一个继续向前推进的路碑。当地各种类型的青铜器物持续发展直至进入汉代。墓葬中都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也包括一些移民的特色之物。

公元前206年,赵陀建立了土王朝,汉王朝委以“南越王”之称。第二个南越王赵昧的墓于1984年在广州市象冈山进行了发掘。这是一座极其华贵的大墓,多室,砖石结构,与北方同期高级别的墓葬不差上下。其葬品和形式折射了汉王朝严格的等级制度,并反映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另一座与之时代相近的大墓,于1976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进行了发掘,为木结构多室墓。它们不著名的墓主也可能是专门管理南方领地的。

纵然,象冈山和罗泊湾的墓葬在许多方面具有西汉较高级别墓葬的特征,但墓穴内的葬品却还是显现了一些先秦时期当地墓葬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因素相融合的迹象。除了大量的陶器、玉器、漆器以及北方汉初时期较为接近的青铜器外,还发现了具有

东南地区民族特色的器物,这种器物在上述两墓的青铜器物群中十分丰富。这也许可以说明,先秦时期的岭南青铜作坊一直持续延用至汉代。具有地区特色的青铜器物,含盖了大量的“越式鼎”。另外,罗泊湾还发现极具特色的乐器“羊角钮钟”,是中国边远南端地区和越南仅有的一种乐器。还有一种铜锣,比起中国早期传统乐器更具东南亚的特色。象冈山墓中除了二套“周式”钮钟外,还有一套称为句鑃的套钟。据铭文记载为公元前129年之物。句鑃是一种本地类型的套钟,在长江下游地区流行了三百余年,至公元前五世纪被楚制套钟所代替。此物的早期样本在吴国和越国所题刻的铭文中都有记载。同时,在最初的句鑃消声匿迹后,岭南似乎一直持续地在铸造这一器物。

西汉时期,从岭南富豪拥有的来自海外的进口“洋货”来看,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时的广州,即曾经称为番禺,最早成了一个进行远洋贸易的重要港口。“洋货”中,较为抢眼的器物是发现于南越王墓中的印地安人或许波斯人制造的多片叶状形的小银盒。这是一个用于放置药物的金属盒。在中国配装了一个青铜台座,盒盖上附加了三个圆柄。作出如此判断的参考物是出土于山东临淄窝托村早期西汉王子墓的一个十分相似的银盒。盒上也曾作过附加的动物躺卧形象的青铜装饰。显然,附加在这些银器上的装饰,是为了适应西汉时期吸收改换国外器物更合乎中国器物形态的潮流。这种国外输入的华丽精品器物对汉代文化的影响与早先周代文化倾注于岭南地区所产生的作用是何等的相象。



本期导读

1. 农业起源是国际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之一,而中国的稻作起源研究由于其丰富的材料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东亚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一文是加拿大著名植物考古学家加里·克劳福德和沈辰博士综合中国、日本和韩国近年来稻作考古方面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所作的述评,在高度评价东亚稻作起源研究成就并赞同某些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首先,作者赞同中国水稻的本土起源说,认为可能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一种热带型粳稻。中国考古发现中未见籼稻,籼稻系起源于南亚地区。但是,对于当前所发现一些最早的水稻遗存(如玉蟾岩、彭头山、贾湖,甚至河姆渡)是否为驯化种,作者却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仍然属于野生种,甚至没有足够的考古证据证明是人为采集利用的结果,直到较晚期的龙虬庄,水稻遗存才有了明显的人工干预迹象。农业起源是一个数千年的漫长过程,而非一种突发的事件,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另外,作者还对中国学者对野生稻的生物分类方法提出了意见,认为目前的分类方法不够细致,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划分。作者比较重视稻作起源中的技术手段,对日本学者的DNA方法表示赞赏,认为它解决了如粳、籼不同起源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最后,作者还提到要重视起源问题的文化和生态背景,强调了多学科系统协作的重大意义。

2. 东周时期《岭南地区青铜礼器的价值和意义》一文考证论述了出土于两广地区(广西、广东)青铜时代晚期大型墓葬的器皿、甬钟等青铜礼器。这些器物,绘出了各种青铜工艺制作的绚丽彩图,它们包括:1. 黄河流域周代列国与长江流域尤其是楚国的青铜器物;2. 与周室有联系的颇具地方青铜文化特征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诸国的青铜器物;3. 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器物;4. 岭南当地青铜铸造作坊的器物。对出土于广西恭城秧家,广东肇庆松山大墓的一些青铜器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查阅核对了它们的器物图录,揭示了当地青铜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概貌。

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的器物与当地铸造的青铜器皿中,挑选了一些与当地陶器在功能意义上相仿,并折射了周代礼仪制度的礼器组合的青铜器物来加以论述。青铜器物和陶器制品的使用惯例与礼仪庆典颇有关联。在文化移入、融合、发展的历史记载中,从周朝皇室中心区输入的青铜礼器,对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当地富豪贵族把占有使用青铜礼器视为操纵权势和标榜威望的象征,这一主要特征亦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印证:即当地铸造的青铜甬钟,并非像北方那样用于音乐演奏,而是出于豪门对权势的贪婪,刻意对北方输入器物加以改制,至使其物丧失了原型原貌,曾有专家认为,为了炫耀岭南当地名流富豪的社会地位与权势声望,他们竭力采用与此相应的青铜工艺铸品的改制措施和当地青铜作坊的仿铸技艺。此种探析,窥视了岭南地区在秦汉统一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地方文化历史发展的运行轨迹。